

学会动态

省历史学会等联合召开“纪念甲午战争 120 周年”学术研讨会

2014 年 9 月 13 日，由省历史学会、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与南京政治学院联合主办的以“反思甲午、鉴古知今”为题的“纪念甲午战争 12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南京政治学院召开。省历史学会会长周新国、南京政治学院佟海青副院长，南京政治学院科研部陈飞部长等出席会议。来自军队及省内的专家学者等 60 余人参加会议。

省历史学会会长周新国在致辞中指出，120 年前的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对中国、日本乃至亚太地区战略格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天，认真总结甲午战争的经验教训，防止战争重演，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南京政治学院科研部陈飞部长在致辞中指出，这场战争决定了中日两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同时推进了二十世纪软弱民族的政治崛起。他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的打击非常大，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后患无穷；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使中国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同时，甲午战争的失败也给中国人民敲响了警钟，促使觉醒的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对于日本来说，甲午战争的胜利使其更加狂妄自大，但多行不义必自毙，最终在 1945 年遭到可耻的失败。

南京大学历史系崔之清教授在题为“耗散中国对决凝聚日本——关于甲午战争的历史反思”的发言中指出，对于甲午战争的研究，一直是中国乃至世界学者所研究的重点问题。从中日两国情况的对比，不难看出中国失败的深层次原因：首先在战争动员方面，日本是举全国之力进行战争动员，而中国则仅是举淮军动员；其次从舆论氛围来看，日本全国充满战争的气氛，对华战争成为日本朝野的主流话题，而中国则是一片和平，百姓甚至许许多多的官员不知道要打仗；第三在战时体制方面，日本当时成立了战时大本营体制，而中国则没有战时体制，仍依靠平时时期的体制去打仗；第四从战略指挥来看，日本是集中统一的战争指挥，而清廷战略指挥分离，陷入了兵家之大忌；第五，日本是高度的中央集权，中国则是地方政府的专政，谈不上集中统一；第六，日本社会处在现代化进程中，而中国社会则在转型中出现危机；第七，日本的军队整合较强，而中国的军队为一盘散沙。正是由于这些显著的不同与差异，造成了在甲午战争中中国遭受惨败的厄运。历史的经验很值得记取。

南京政治学院汤晓华教授在题为“深刻总结历史教训，大力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发言中指出，甲午战败是晚清军事改革失败的必然结果。一是清政府的军事改革是在面临对外丧权辱国、对内统治地位受到严重威胁的危急情况下，不得以进行的改革，这就必然导致晚清政府在这场变革中，既缺乏主动性，也缺乏远见性。二是晚清军事改革的局限性必然导致改革只能停留在器物层面。晚清政府和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在思想上始终以天朝上国自居，有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不肯承认西方制度的先进性，固守旧有的体制不放，他们甚至真诚的相信中国的文武制度是保持中国几千年悠久历史的精华，在“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下，改革始终不能在军事思想、军事体制、作战方式等方面进行革新。三是晚清封建制度的腐朽性必然导致军事改革进程步履维艰。任何军事变革都必须有相应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变革与之相配合，否则难以深入持久地进行。晚清政府在进行军事变革时，不但没有同时进行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反而使新的军事变革同旧的封建制度产生了尖锐矛盾。他认为，社会历史条件对军事改革的制约作用是决定性的。无论是国家的经济实力还是生产关系方面，当时的清王朝虽然使城市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主体仍然是落后的封建小农经济，落后的生

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难以产生强大的经济实力，加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严重制约了军事改革的视野和发展道路。他指出，我们今天要着眼未来，大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的改革，正确把握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目标和指导原则，在战略全局上加强统筹谋划，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深化军队政策制度改革，并推动军民融合向深度发展。

省历史学会周新国会长与周隽合作的题为“日本‘皇国史观’思想的演进与甲午战争”文章中指出：“皇国史观”是日本近代天皇制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体现，是日本军国主义动员的精神主脉，其思想因子，可追溯到公元8世纪以汉字书写的日本古典《古事记》一书；至中世，伊势神道的五经典之一《倭姬命世纪》宣称：“大日本神国也，依神明之加被”。此种神化日本的“神国论”和由传说中的初代天皇“神武大帝”臆想的“八纮为宇”理论直接推衍出日本海外扩张和侵略的思想因子。1894年发生的甲午战争，使日本在此次战争中得到了从未有的巨大的战争利益，并成为日本“皇国史观”确立的标志，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八纮为宇”思想的一次重要实践。此战改变了东亚几千年来的华夷秩序，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霸主。从此，日本岛国心理的狭隘民族主义与皇国史观的神国论，大和民族的优越感与八纮为宇思想，武士道精神的好战与法西斯主义的残暴疯狂等心态交织在一起，使日本和亚洲人民深受侵略战争毒害，这个历史教训极其深刻而惨痛。

会上发言的专家还有：海军指挥学院赵克增教授的“对甲午战争中两个全局的历史考证”、省社科院陆仰渊研究员的“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南京师范大学经盛鸿教授的“论甲午海战中的刘步蟾”、南京师范大学谢世诚教授的“中朝宗藩关系与甲午战争”等。最后，省历史学会副会长陈谦平教授做了会议总结。

（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 杨颖奇）

省明清小说研究会等联合召开文化视阈中的明清小说学术研讨会

2014年8月20日至21日，由省明清小说研究会主办、淮阴师范学院承办、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协办的“文化视阈中的明清小说学术研讨会”在淮安市高沟镇召开，来自省内各地的40位代表围绕明清小说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本次大会共收到论文26篇，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江苏学人在作者考证、版本梳理、文本解读以及小说与其他文体的互文关系、小说创作与接受的演变规律等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既有对小说从文化层面进行的宏观论述，亦有对小说个案的微观分析，研讨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小说新资料的挖掘发现。苗怀明、宋楠的《国外首部〈金瓶梅〉全译本的发现与探析》主要介绍了加布伦兹德译本《金瓶梅》手稿本的发现始末及主要特点，提出该译本是国外第一部《金瓶梅》全译本，它的发现把《金瓶梅》全译本在欧洲的出现时间提前了半个多世纪，这将为学界深入探索《金瓶梅》的版本流变及海外接受情况提供新的材料。于师号的《〈夜雨秋灯录〉本事考拾遗五则》，借助《备修天长志稿》、《重修恩县志》等方志文献，将《夜雨秋灯录》与《耳食录》、《右台仙馆笔记》等作品进行细读考对，考定了《刖妖楼》、《吴孝子》、《秃发张》等五篇小说的本事，对进一步明确《夜雨秋灯录》的小说性质、创作轨迹、艺术特性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小说不同于西方小说的“本事”传统。

二是小说历史文化的研究。冯保善的《论明清江南通俗小说中心圈的形成》对小说创作及接受生态与社会诸多文化因素之间进行了梳理，重点探讨了明清江南通俗小说中心圈的形成及其原因，认为明代万历二十年以前，通俗小说仅处在起步阶段；万历二十年以后的二十年时间，通俗小说在江南与建阳各有专长，形成了通俗小说的两个中心；天启崇祯两朝，建阳开始从通俗小说中心淡出，而江南无论是小说的创作还是出版都成为全国的绝对中心；进

入清代，江南更成为通俗小说创作、评点与出版为一体的唯一中心圈。作者通过文化视角的综合考量，认为江南之所以成为全国通俗小说中心，与其充足的小说创作与评点人才储备等有着密切关系。吴琼的《明代社会心理与冥婚题材文言小说的创编》通过对冥婚题材文言小说的分类梳理与深入解析，认为元明易代的战乱创伤、空幻意识和崇情倾向、贞洁观念的深入等社会心理深刻影响了明代冥婚题材的文言小说创作。齐慧源的《孙悟空形象与中国民间拜石文化》从孙悟空形象的塑造进行考察，认为石猴出生体现了拜石神话中生育母题的嬗变，是民间习俗对神石信仰寄托的再现。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从法律的视角来重新解读古代小说作品，即齐孝东的《法律语境下〈一文钱小隙造奇冤〉的醒世价值》、韩希明的《从〈阅微草堂笔记〉看纪昀的法律观》，反映出近年来对小说文化解读的新意识和新趋向。

三是小说与戏曲、插图等之间的互文关系研究。蒋宸的《才子佳人小说与中晚明言情戏故事模式之渊源关系探略》从情节结构、人物类型化、婚恋模式等方面，试图阐说才子佳人小说与中晚明风情戏在故事模式上的渊源关系。赵兴勤的《情节模式的承继与改造——论〈金瓶梅词话〉中的常时节故事与韩小窗〈得钞傲妻子〉的改编》通过文本比较，对《金瓶梅》中不起眼的角色常时节被韩小窗改编成子弟书《得钞傲妻》的情形及背后原因进行了探究。伏涤修、伏蒙蒙的《〈金瓶梅词话〉〈红楼梦〉对〈西厢记〉的不同接受》通过同例比较，认为二者对《西厢记》的接受呈现出俗雅悬殊的两种倾向。值得关注的是，乔光辉的《象征与变形：建本〈水浒传〉插图之于文本的接受》通过大量例证分析，认为建本插图不分场合的礼节化、梁山好汉普遍的“儒士化”与建阳地区深厚的理学底蕴密不可分。

四是对《水浒传》和施耐庵的研究。莫其康的《浦著〈施耐庵传〉指谬》、陈麟德的《不能容忍对施耐庵故里指鹿为马——为浦玉生先生执瑕》、任祖镛的《对〈浙江文学史〉中施耐庵籍贯表述的质疑——与王嘉良等先生商榷》等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施耐庵故里当为兴化而非大丰，足见兴化文化界对《水浒传》及施耐庵研究的热情，这些成果对于认识施耐庵故里归属问题，不无助益。

会议期间，省明清小说研究会进行了换届选举，产生了以萧相恺为会长的新一届理事会。

（省明清小说研究会 于师号）